

曾与陈毅夫、徐绍一起参加上海地下学生运动的林德明和朱可常,也于1942年2月秘密来到皋东,投身抗日战场。

朱可常和王季凤 父母朱可常、王季凤对朱可常及其两个弟弟参加革命有重要的影响。

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多次提到朱可常,提出“我希望在中国近代话剧史上,不要遗漏这位先驱者的名字”。

朱可常(1901—1943),又名成湘,苏州东山屯湾人。东山沪地富商朱献淮的长子,早年毕业于上海圣芳济中学,原想进大学深造,父亲却让他进银行当了职员。

1921年夏,朱可常联合精武体育会中几位对新文化、新思想有共同追求的知识分子,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因该年为农历辛酉年,故取名为“辛酉学社”,自任总干事。

1928年10月,朱可常与田汉



林德明

洪深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戏剧运动协会”,推动我国早期话剧运动。这期间朱可常结识了潘汉年、夏衍等党在文化界的领导人,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0年的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加剧,“左翼剧联”不能公开活动,辛酉剧社也被迫解散。为了寻找救国之路,朱可常打算到苏联去,找他这个愿望告诉了夏衍,告诉了妻子王季凤,他决定先到法国去,然后再设法转到苏联去。

朱可常到了法国就读于索尔邦大学。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反帝大同盟”法国分会中国组组长、旅法支部书记。

朱可常曾和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一起住在巴黎拉丁区。每逢节日聚会,洗星海的音乐节目和朱可常编导的短剧受到华侨工人和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王季凤(1905—1977),1905年生于上海,父亲王叔棒在上海金融界很有名望,是沪地多家钱庄的首脑(经理)。与朱可常父亲既有业务往来,又是同乡好友,经人介绍,王季凤从小就与朱可常定了亲。

方人员把朱可常用小汽车带走了,当时火车上还有人羡慕说朱会说俄文受优待,后来过了边境到了中国还是不见朱回来,大家这时才明白朱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扣留逮捕了。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此后家里与朱可常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王季凤到处托朋友打听,但只能听到种种传闻,据说他在回国途中经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又听说他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镇压。朱可常曾多次拜访夏衍,向他询问朱可常的信息,得知:抗战时期夏衍在重庆时,重庆的戏剧界人士提到朱可常失踪,周恩来同志曾派人去了解,但没有什么结果。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恢复两党关系,朱可常弟弟三人即联名写信并附上有关材料,通过中共中央联络部转交苏联驻华大使馆请苏方查寻。

1990年初,中央联络部转来一份由苏联驻华使馆交给的关于朱可常在苏联遇难和恢复名誉的材料,终于揭开了朱可常失踪之谜:朱可常于1938年4月15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莫须有的“间谍罪”逮捕判处劳改营监禁八年。

1939年5月7日朱可常被送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的诺里尔劳改营,1940年9月24日被转到克麦罗沃州的西伯利亚劳改营,1943年1月17日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

1994年,俄罗斯邀请朱可常大弟王光华去莫斯科参加某科技会议,得到外交部部长钱其琛的支持和批准,在会议结束后,由我驻俄罗斯使馆和俄罗斯外交部人员陪同一起前往埋葬朱可常的墓地凭吊悼念,但俄方对死亡人员没有埋葬记录,未能找到朱可常遗骨,带回的仅是黄土一抔。

2010年朱可常与二弟朱承中将朱可常的情况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详细汇报,请求给父亲做一政治结论,以宽慰他的在天之灵。2011年11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发文,再次洗刷了朱可常蒙受的不白之冤。

王季凤(1905—1977),1905年生于上海,父亲王叔棒在上海金融界很有名望,是沪地多家钱庄的首脑(经理)。与朱可常父亲既有业务往来,又是同乡好友,经人介绍,王季凤从小就与朱可常定了亲。

1921年,朱可常组织辛酉学社。王季凤夫妻相随,在征得婆婆叶氏同意后,也成为辛酉学社的社员,有时还出演女主角。她还回娘家说服了父母,把胞妹王福之也动员出来参加了辛酉学社。丈夫朱可常领导剧团排演节目,王季凤做好后勤工作,被大家称为剧团里的“大嫂”。1927年,辛酉学社内部发生

暨南附中四杰之林德明与朱可常

吴剑坤

潜经新四军秘密交通线来到皋东的热血青年(六)

季凤认了“过房母子”的关系,王季凤每天给吴学谦做饭,照料他的日常生活。王季凤掩护过上海地下党一大批革命同志,被称为“革命妈妈”。

1934—1938年,朱可常曾与苏联籍犹太人女作家勃鲁姆同居三天,抗战胜利后,勃鲁姆于1947年从苏联来华寻找丈夫朱可常,辗转未遇。建国后,找到上海王季凤打听。看到朱可常的照片,紧紧地拿着照片,恳求道:“送给我吧!这时,王季凤气得连话也讲不出来了。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了勃鲁姆的要求。王季凤希望听到丈夫更多的情况,于是留勃鲁姆在家中住了三天。勃鲁姆开始以为王季凤不让她与朱可常见面,但是一直没看到朱可常,方才相信王季凤没有欺骗她。

王季凤和朱可常婚后共同生活十二年,生育了五个孩子,两个孩子未成年因病夭折,其中三个孩子在丈夫离家出国后,由王季凤独自一人抚养。在父母亲的影响下,朱可常和两个弟弟先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朱承坚,1940年加入地下党,1948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他。8月,经组织安排,赴华中解放区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派刘晓到上海主持恢复和重建地下党组织。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并建立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抗战时期,周一萍担任学委书记,张英、林修德、吴学谦等先后担任委员。

1937年10月,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中共上海学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学协”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和后备军。在“学协”,学生除了自行组织学习、看书,还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办墙报、发传单、演戏剧、唱救亡歌曲等。

为此,9月成立学协党团,张英、林修德等先后担任党团书记、陈伟达、林德明、陈毅夫等担任委员。学委通过学协党团、区党团以及各校党支部或党员,对学协各级组织进行领导。参加学协的成员都是经过党的教育、培养而有一定觉悟的积极分子。

林德明和朱可常都是学协成员。

林德明(1918—2002),曾用名吴开训,海南文昌人,父亲是割树胶的工人。幼年随父亲到南洋



林修德(1)、林德明(2)、陈毅夫(3)、朱可常(4)等热血青年于1938年在排练了抗日话剧后合影

(新加坡)读书,1935年返回祖国。曾经就读于广州西南艺术学院,1936年到上海,入暨南大学附中上学。毕业后入政法学院,1941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史地系肄业。

在暨大附中,林德明参加学生界救国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上海学协,任区干事,组织本区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后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地下党支部负责人。1940年夏至1942年2月,负责人吴学谦就住在朱家。为了便于掩护,吴学谦经党组织同意,与王



2019年,96岁的朱可常(中)正接受暨南大学学生的采访

会中学区委书记,与陈伟达、陈毅夫、朱可常是战友。

比林德明小5岁的朱可常在暨大附中就读时,也加入了“学协”。受父亲的影响,朱可常从小就爱好文艺,朱可常教女儿从小唱昆曲,她7岁登台,朱可常还担任伴奏,父女同台,传为佳话。在“学协”,朱可常在戏剧组表演救亡戏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明天》《抗日斗争》等,她在《明天》里担任过女主角。抗战期间,著名学者王元化曾在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的上海戏剧家协会工作,有一次到暨南附中为学生剧团去排丁玲的《重逢》,当时的演员有林修德、朱可常、林德明等。

林修德是朱可常的革命引路人,时常给她推荐共产党、毛泽东的相关书籍,加上父母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38年,年仅16岁朱可常在在校期间就入党。朱可常在参加中区救亡协会活动后,成为了学生界共产党中区区委委员、书记。1941年,女中区委改为女中工委(又称学分委),朱可常任书记。下半年,女中工委改为女中大区委,朱可常任书记。

在中区救亡协会工作时,她还不遗余力地介绍了五六位优秀人才入党,壮大党的队伍,发展党的事业。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林德明、朱可常身份暴露,根据组织安排,经过新四军地下交通线秘密来到皋东抗日根据地。两人在皋东结婚,在烽火岁月夫妻二人聚少离多。

林德明先后任中共如东县委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公安局长。抗战胜利后,任如东县县委书记、县警卫团政委。

苏中“七战七捷”后,我华中主力实行北上战略转移,上级决定成立九地委辖通海如海启四县。鉴于此,中共华中九地委决定加强对“如中”地区反国民党军队“驻剿”、“反”、“会剿”斗争的领导。地委委员、组织部长王野翔同志请求兼任如东县委书记,“坐镇”如中地区。原如东县委书记林德明,改任县委副书记,兼如中工委(辖景安、城东、耕丰三个区)书记。王野翔、林德明等跟区、乡干部均宣誓与群众同生死,共存亡,达到反“驻剿”、“反”、“会剿”斗争的完全胜利。

1947年4月底,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中共华中九地委在《江海报》上发出致王野翔、林德明同志并耕丰、景安、城东区委的公开函,嘉奖已经取得的胜利,并称如中地区是敌后胜利坚持的旗帜。1947年夏,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特派记者、九支社社长孙明、林子东对如中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坚持敌后斗争的光辉历程向延安总社作了系列报道。这些报道,给坚持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以很大的鼓舞。

朱可常到皋东后担任县委民运部长,组建民兵游击队,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她共带领发动3000人参与保卫祖国的解放战争,发展党员六七名。“这是基于在暨大时,参与学生运动的领导经验。”朱可常说。

1942年夏,如中分县委、如东县政府西区政府在苏中区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举办了暑假讲习班(习惯上也叫夏令营),方由邱国中学、耕茶中学、县联中等学校来的中学生共100多人,其中以邱国中学的学生占多数。夏令营既是中学生暑假的重要活动,又是党的干部新生力量培训班。讲习班的组织领导,由如中县委抽调和苏中行署文教处支援的三名党员干部组成。负总责的是林云峡,另外还有朱可常、薛家骥。林云峡担任班主任,朱可常担任支部书记。

讲习班的学习方式主要有举办讲座、开展专题讨论和辩论,开展广泛的读书活动,办墙报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

林云峡通过县委先后请来苏中区宣传部长俞铭璜讲《共产主义人生观》,苏中教育界抗敌协会党组书记曹一凡讲《中国革命问题》、西区行署文教科长蔡迪介绍《社会科学简明教程》,苏中教抗理事徐静涛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林淡秋主讲革命文艺,靳斯馨介绍鲁迅。著名记者范长江刚从大后方来,路过如中北上,特请来介绍国民党统治区的见闻。苏中四分区专员季方同志也来作报告。当时同学

们听到这么多负责同志报告,都觉得很高兴,开拓了视野,受到了极好的革命启蒙教育。在每次听报告之后,林云峡等夏令营的负责人组织同学们学习讨论,进一步领会精神实质。

30多天的讲习班生活,同学们明白了不少革命的道理,萌发了革命思想,激发了革命激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讲习班的活动,在广大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这次夏令营后期就有10多位学生先后入了党,并陆续地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1947年下半年朱可常从苏北九分区秘密回上海,学委书记张本和地商谈请九分区协助开辟交通线输送撤退人员,得到支持。嗣后建立青沪港交通线关系,很快就培养建立了一支秘密交通工作队伍,并且在海口建立交通站。

渡江战役以后

1949年,上海解放。朱可常担任南通地区的青年团书记。1952年,朱可常被调回上海,担任华东纺织工业党委宣传部部长,后又为上海市委轻工业部办公室主任、虹口区区委书记。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党内进行整风运动,朱可常的区委书记职位被撤销,降任为某工厂副厂长。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她得到平反,成为上海歌剧院院长。自此在文艺界工作长达三年。

1963年9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朝鲜,朱可常率《小刀会》剧组随团访问演出,得到了朝鲜党政领导和观众的好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朱可常第二次遭到批判。朱可常在主持上海歌剧院期间取得的这些成绩居然在几年后爆发的文革中成了批判他的罪状。最可笑的一条罪名是,声称,朱可常积极推出《蝴蝶夫人》,是因为想借乔乔桑唱“晴朗的一天”之口,怀念自己下落不明的父亲,而遭反派认为她父亲去了苏联,就是苏修。在朱可常常因沾上文艺黑线被隔离审查的同时,林德明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也被指责为勾结法黑线人物而投入牢中,惨遭迫害。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二人才得以平反。

文革结束后,朱可常先后到上海市文化局、上海舞蹈学校工作。1984年5月,与上海市妇联副主任曹舜琴一起率领“中国上海市儿童艺术团”应邀到加州文化节基金会的邀请,先后在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等地演出音乐、舞蹈节目。访美27天,原定演7场,结果演了19场。17日应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的邀请在白宫演出,五百多位共和妇女代表观赏,赞叹不已。

后来又在美国创办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主持剧团、医院、出版社、少年宫等工作。

1979年1月26日下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并宴请沈粹缙、朱可常、陈维博、吴志恒等中国福利会领导后,宋庆龄又招待大家在客厅看了场电影。此次宴会名义上是为了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实际上是宋庆龄有意的安排,让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陪自己欢度86岁生日。

1984年,在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朱可常的组织领导下,积极筹办了由巴金、叶公琦为名誉会长,朱可常任会长的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后,经中央安排,朱可常于30日上午赴京,参加宋庆龄的治丧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林德明历任南通地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署公安局局长,崇明县军管会主任,苏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林德明离休后,重新拿起画笔,创作了许多国画、水彩画作品,圆了年轻时的艺术梦。2003年2月,在林德明逝世周年之际,《林德明画集》问世,91岁的朱可常为之作序。

主要参考资料

王顾编,《王野翔回忆纪念集第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

朱可常:《朱可常: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杨维忠编著,《东山名彦 苏州东山历代人物传》,古吴轩出版社,2007。